

卡·馬克思 不列顛在印度的統治¹¹⁷

1853年6月10日星期五于倫敦

据維也納電訊报道，那里对于土耳其問題、撒丁問題和瑞士問題的和平解决都很有信心。

昨晚下院繼續辯論印度問題，辯論情况同往日一样平淡无味。布萊克特先生責备查理·伍德爵士和德·霍格爵士，說他們的发言有点假乐观主义。內閣和董事会的一批辯護士对这个責难极力加以反駁，而无所不在的休謨先生則在結論中要大臣們把法案收回去。辯論最后决定改期举行。

印度斯坦——这是亚洲規模的意大利。喜馬拉雅山相当于阿尔卑斯山，孟加拉平原相当于倫巴第平原，德干高原相当于亚平宁山脉，錫兰島相当于西西里島。在土地出产方面是同样地富庶繁多，在政治結構方面是同样地四分五裂。意大利常常由征服者用宝剑强迫把不同的民族集团合攏在一起，印度斯坦的情况也完全一样：在它不处于穆斯林、莫臥儿或不列顛人的压迫之下的那些时期，它就分解成像它的城市甚至村庄那样多的各自独立和互相敌对的国家。但是从社会方面来看，印度斯坦却不是东方的意大利，而是东方的爱尔兰。意大利和爱尔兰——一个淫乐世界和一个悲苦世界——这样奇怪地結合在一起的現象，在印度斯坦的宗教的

古老傳統里早就显示出来了。这个宗教既是纵欲享乐的宗教，又是自我折磨的禁欲主义的宗教；既是林加崇拜的宗教，又是札格納特的宗教¹¹⁸；既是和尚的宗教，又是舞女的宗教。

我不同意那些相信印度斯坦有过黄金时代的人的意见，也不必为了证实自己的看法而搬出庫利汗統治时期，像查理·伍德爵士所做的那样^①。但是大家可以拿奥朗則布时期做例子；或者拿莫臥儿出現在北方而葡萄牙人出現在南方的时期做例子；或者拿穆斯林入侵和南印度七国爭雄¹¹⁹的时期做例子；或者，如果大家願意追溯到更远的古代去，那就可以拿婆罗門自己的神話紀年看一看，它把印度灾难的开端推到了甚至比基督教的世界創始时期更远的时候。

但是，不列顛人給印度斯坦带来的灾难，与印度斯坦过去的一切灾难比較起来，毫無疑問在本质上屬於另一种，在程度上不知要深重多少倍。我在这里所指的还不是不列顛东印度公司在亚洲式的专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欧洲式的专制，这两种专制結合起来要比薩尔賽达庙¹²⁰里的猙獰的神像更为可怕。这种結合并不是英国殖民制度独有的特征，它只不过是對荷兰殖民制度的模仿，而且模仿得十分确切，所以为了說明不列顛东印度公司的活动，只要把英国的爪哇总督斯坦弗德·萊佛尔斯爵士談到旧时的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时候說过的一段話一字不改地引过来就够了：

“荷兰东印度公司一心只想賺錢，它对待自己的臣民还不如过去的西印度种植場主人对待他們的奴隶，因为这些种植場主买人的时候还付过錢，而荷兰东印度公司一文錢都沒有花过，它只运用全部現有的专制机构压榨居

① 見本卷第140頁。——編者注

民，使他們把最后一点东西都交納出来，把最后一点劳力都貢獻出来。这样，它就加重了任意妄为的半野蛮政府所造成的禍害，因为它是把政治家的全部实际技巧同商人的全部壟断利己心腸結合在一起进行統治的。”

內战、外侮、政变、被征服、鬧饥荒——所有这一切接連不断的灾难，不管它們对印度斯坦的影响显得多么复杂、猛烈和带有毁灭性，只不过触动它的表面，而英国則破坏了印度社会的整个結構，而且至今还没有任何重新改建印度社会的意思。印度失掉了他的旧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这就使它的居民現在所遭受的灾难具有了一种特殊的悲惨的色彩，并且使不列顛統治下的印度斯坦同自己的全部古代傳統，同自己的全部历史，断絕了联系。

在亚洲，从很古的时候起一般說来只有三个政府部門：財政部門，或對內进行掠夺的部門；軍事部門，或對外进行掠夺的部門；最后是公共工程部門。气候和土地条件，特别是从撒哈拉經過阿拉伯、波斯、印度和韃靼区直至最高的亚洲高原的一片广大的沙漠地带，使利用渠道和水利工程的人工灌溉設施成了东方农业的基础。無論在埃及和印度，或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以及其他国家，都是利用河水的泛滥来肥田，利用河流的漲水来充注灌溉渠。节省用水和共同用水是基本的要求，这种要求，在西方，例如在弗兰德斯和意大利，曾使私人企业家結成自願的联合；但是在东方，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員太大，不能产生自願的联合，所以就迫切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来干預。因此亚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执行一种經濟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这种用人工方法提高土地肥沃程度的設施靠中央政府办理，中央政府如果忽略灌溉或排水，这种設施立刻就荒廢下去，这就可以說明一件否則无法解釋的事实，

即大片先前耕种得很好的地区现在都荒蕪不毛，例如巴尔米拉、彼特拉、也門廢墟以及埃及、波斯和印度斯坦的广大地区就是这样。同时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一次毁灭性的战争就能够使一个国家在几百年内人烟蕭条，并且使它失去自己的全部文明。

现在，不列颠人在东印度从他们的前人那里接收了財政部門和軍事部門，但是却完全忽略了公共工程部門。因此，不能按照不列颠的自由竞争原则——*laissez faire, laissez aller* [听之任之] 原则¹²¹——来发展的农业便衰落下来了。但是我们在亚洲各国经常可以看到，农业在某一个政府統治下衰落下去，而在另一个政府統治下又复兴起来。收成的好坏在那里决定于政府的好坏，正像在、欧洲决定于天气的好坏一样。因此，假如沒有同时发生一种重要得多的、在整个亚洲史上都算是一种新事物的情况，那末无论对农业的損害和忽視多么严重，都不能认为不列颠侵略者正是在这一点上使印度社会遭到了致命的打击。从遙远的古代直到十九世紀最初十年，无论印度的政治变化多么大，可是它的社会状况却始终沒有改变。曾經产生了无数紡工和織工的手紡車和手織机是印度社会結構的樞紐。欧洲从很古的时候起就得到印度制作的絕妙的紡織品，同时运貴金屬去交換，这样就給当地的金匠提供了原料，而金匠則是印度社会里的必要成員，因为印度人极其爱好裝飾品，甚至最低階級中的那些几乎是裸体的人們通常都戴着一副金耳墜，脖子上套着某种金飾品。手指和脚趾上戴环戒也很普遍。妇女和孩子常常戴着沉甸甸的金銀臂鐲和脚鐲，而金銀的神像在普通的家庭中都可以看到。不列颠侵略者打碎了印度的手織机，毀掉了它的手紡車。英国起先是把印度的棉織品挤出了欧洲市場，然后是向印度斯坦輸入棉紗，最后就使这个棉織品的祖国充滿

了英国的棉織品。从1818年到1836年，大不列顛向印度輸出的棉紗增长的比例是1:5 200。在1824年，輸入印度的英国細棉布不过100万碼，而到1837年就超过了6 400万碼。但是在同一时期內，达卡的人口却从15万人减少到2万人。然而，曾以制造业聞名于世的印度城市遭到这样的衰落决不是英国統治的最坏的結果。不列顛的蒸汽和不列顛的科学在印度斯坦全境把农业和手工工业的結合彻底摧毀了。

在印度有这样两种情况：一方面，印度人民也像所有东方各国的人民一样，把他們的农业和商业所凭借的主要条件即大規模公共工程交給政府去管，另一方面，他們又散处于全国各地，因农业和手工业的家庭結合而聚居在各个很小的地点。由于这两种情况，所以从很古的时候起，在印度便产生了一种特殊的社会制度，即所謂村社制度，这种制度使每一个这样的小单位都成为独立的組織，过着閉关自守的生活。从过去英国下院关于印度事务的一份官方报告的下面一段描写中，可以看出这个制度的特殊性质：

“从地理上看，一个村社就是一片占有几百到几千英亩耕地和荒地的地方；从政治上看，它很像一个地方自治体或市鎮自治区。它通常設有以下一些官員和職員：帕特尔或村社首脑一般是总管村社的事务，調解居民糾紛，行使警察权力，执行村社里的收稅职务——这个职务由他担任最合适，因为他有个人影响，并且对居民的状况和营生十分熟悉。卡尔納姆負責督察耕种情况，登記一切与耕种有关的事情。还有塔利厄尔和托蒂，前者的职务是搜集关于犯罪和过失的情报，护送从一个村社到另一个村社去的行人；后者的职务范围似乎比較限于本村社，主要是保护庄稼和幫助計算收成。边界守卫員負責保护村社边界，在发生边界爭議时提供证据。水庫水道管理員負責分配农业用水量。有專門的婆罗門主管村社的祭神事宜。教师教村社的儿童在

沙上念书和写字,另外还有管历法的婆罗門或占星师等等。村社的管理机构通常都是由这些官員和職員組成;可是在国内某些地方,这个机构的人数并没有这么多,上述的各种职务有些由一人兼任;反之,另外也有些地方又超过上述人数。从很古的时候起,这个国家的居民就在这种简单的自治制的管理形式下生活着。村社的边界很少变动。虽然村社本身有时候受到战争、饥荒或疫病的严重損害,甚至变得一片荒凉,可是同一个村社的名字、同一条边界、同一种利益、甚至同一个家族却一个世紀又一个世紀地保持下来。居民对各个王国的崩潰和分裂毫不关心;只要他們的村社完整无損,他們并不在乎村社受哪一个国家或君主統治,因为他們内部的經濟生活是仍旧沒有改变的。帕特尔仍然是村社的首脑,仍然充当着全村社的裁判官和稅吏。”¹²²

这些細小刻板的社会机体大部分已被破坏,并且正在完全归于消灭,这与其說是由于不列顛的收稅官和不列顛的兵士粗暴干涉,还不如說是英国的蒸汽和英国的自由貿易造成的結果。这些家族式的公社是建立在家庭工业上面的,靠着手織业、手紡业和手力农业的特殊結合而自給自足。英国的干涉則把紡工安置在郎卡郡,把織工安置在孟加拉,或是把印度紡工和印度織工一齐消灭,这就破坏了这种小小的半野蛮半文明的公社,因为这破坏了它們的經濟基础;結果,就在亚洲造成了一場最大的、老实說也是亚洲历来仅有的一次社会革命。

从純粹的人的感情上來說,亲眼看到这无数勤劳的宗法制的和平的社会組織崩潰、瓦解、被投入苦海,亲眼看到它們的成員既丧失自己的古老形式的文明又丧失祖傳的謀生手段,是会感到悲伤的;但是我們不應該忘記:这些田园風味的农村公社不管初看起来怎样无害于人,却始終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們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範圍內,成为迷信的馴服工具,成为傳統規則的奴隶,表現不出任何偉大和任何历史首創精神。我們不應該忘記

那种不开化的人的利己性，他們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一块小得可怜的土地上，靜靜地看着整个帝国的崩潰、各种难以形容的殘暴行为和大城市居民的被屠杀，就像观看自然現象那样无动于衷；至于他們自己，只要某个侵略者肯来照顾他們一下，他們就成为这个侵略者的无可奈何的俘虏。我們不應該忘記：这种失掉尊严的、停滞的、苟安的生活，这种消极的生活方式，在另一方面反而产生了野性的、盲目的、放纵的破坏力量，甚至使惨杀在印度斯坦成了宗教仪式。我們不應該忘記：这些小小的公社身上帶着种姓划分和奴隶制度的标记；它們使人屈服于环境，而不是把人提升为环境的主宰；它們把自动发展的社会状况变成了一成不变的由自然預定的命运，因而造成了野蛮的崇拜自然的迷信，身为自然主宰的人竟然向猴子哈努曼和牡牛撒巴拉^①虔誠地叩拜，从这个事实就可以看出这种迷信是多么糟踐人了。

的确，英国在印度斯坦造成社会革命完全是被极卑鄙的利益驅使的，在謀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上也很愚鈍。但是問題不在这里。問題在于，如果亚洲的社会状况沒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如果不能，那末，英国不管是干出了多大的罪行，它在造成这个革命的时候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这么說来，無論古老世界崩潰的情景對我們个人的感情是怎样难受，但是从历史观点来看，我們有权同歌德一起高唱：

*«Sollte diese Qual uns quälen
Da sie unsre Lust vermehrt,*

① 哈努曼是印度傳說中的神猴，后来被奉为印度教的毗湿奴的化身。撒巴拉是神牛，在印度教中被奉为財富和土地之神。——譯者注